

人的经济路径

REN DE JING JI LU JING

苏东斌 著

红旗出版社



作者小传

苏东斌，1945年生于哈尔滨市，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现任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深圳市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20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近10年来，结合中国改革的实践进行“人的经济”的研究。出版专著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1987年）、《现代政府经济行为》（1992年）、《苏东斌集》（增订本，1997年）、《选择经济考察述要》（1999年）等。

他的“劳动者价值”（1987年）、“新社会主义论”（1989年）等学术观点和“税收大于利润”（1996年）、“三级授权经营制过渡论”（1998年）、“激励创造供给”（1999年）等政策主张，以及“目的论”（1992年）、“两个检验标准的逻辑统一”（1998年）等思想方法在中国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

目 录

历史的诱惑	
——从司汤达谈起（读书代序）	1
走向现代文明	8
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思想	10
国有企业改革的两项战略性任务	25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看政府调控的必要与局限	35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行	39
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结构的三大要求	69
努力创造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实现条件的制度因素	80
让资本在市场中荡漾	86
扩大需求尤其应关注“改革因素”	90
“企业兼并”须慎行	94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说：“2005 年深圳将 基本实现现代化”	98
建议深入探索深圳与外地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101

激励创造供给	
——关于高新技术产业中人力资本的研究报告	103
跨越“九七”	
——回归后香港经济持续繁荣的两大因素	210
小也会是美好的	
——澳门经济发展的三大优势	216
充分发挥粤深的“借鉴优势” 尽量吸收香港的 “体制资源”	
——广东和深圳的另一个优势	224
两个检验标准的逻辑统一	
——对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再探索	227
“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神圣地位	233
“希望”之所在	
——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一课	246
“货币瓦解公社”	
——邓小平改革理论中的重要一节	254
现实对逻辑的拷问	
——关于“解放思想”的札记	265
两个“伟大的创举”	275
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	277
走向人类文明	285
来自选择的幸福	
——《选择经济考察述要》自序	293

《选择经济考察述要》后记	302
理性的浪漫	
——《苏东斌集》(增订本) 自序	304
《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自序	307
《走出贫困》自序	310
《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自序	312
《苏东斌集》自序	315
毕竟走出来了	
——《当代中国理论经济学主要流派》序	318
胸怀与智慧	
——《台湾香港公营经济》序	322
“一样的天地”	
——《台湾经济性特区的发展与转型研究》序	327
实现一场产业革命	
——《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序	332
未达之志	
——《转型期的经济与社会》序	337
怎么办?	
——《教育链》序	343
智慧的痛苦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五) 读后	355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记录》读后	363
创新的灵魂又在哪里？	
——读《决胜 21 世纪》	365
抄袭的根源	369
 附录：	
思想者	
——记深圳市宣传文化精品奖获得者苏东斌	陈宏 371
繁荣来自竞争	
——就中国加入“世贸”与苏东斌教授一席谈	吕延涛 373
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苏东斌教授访谈录	亚勇 范永泉 377
苏东斌与经济学主体的研究	杨雪松 381
选择的幸福	
——评苏东斌著《选择经济考察述要》	何方 393
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刘一伟 396
后 记	402

历史的诱惑

——从司汤达谈起

(读书代序)

他没有等到 1848 年的欧洲大革命，没能亲眼看到封建王朝的彻底覆灭，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已在 1842 年就去世了。

但他既经历了前三十年的“革命年代”，又渡过了后三十年的“复辟统治”。否则，我们就不会读到那些像《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红与白》那样具有强烈时代震撼力的作品了。

在小说里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革命的波折：

这一阵子吉伦特派当权，下一阵子雅各宾派执政；后来马拉被暗杀，雅各宾派被推翻，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于是保王派趁机在各地发动叛乱，甚至想夺取巴黎；他们的阴谋被年轻将领拿破仑一举粉碎。这以后拿破仑称帝，接着又把革命的烽火烧向全欧洲，但是征俄一战，惨遭失败，拿破仑被放逐于厄尔马岛；再后来波旁王朝复辟；接着拿破仑潜逃回来，重新登台，但他只支撑了一百天，波旁王朝第二次卷土重来，一度被赶下台的路易十八重新执政；以后又是查理十世统治，六年后又引起七月革命，革命失败，统治大权就转到路易·菲力浦手里……①

革命曲折的根源在于权力与利益再分配中反均衡的制度（不

① 参见辛未艾：《红与白》译文序。

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上的安排。

当我们读到老奸巨滑的法国金融家老勒万担心他的儿子“干这一行是不是有足够的卑鄙”时，曾对他的儿子吕西安直言不讳地询问：“你觉得，做一个卑鄙无耻的坏蛋，或者说，帮助别人干卑鄙无耻的勾当，你究竟使得出多大的力量？”^① 我们也就能够撩开金元政治狼狈勾结的虚伪面纱了；而当我们听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曾呼吁“让我们结束这场革命吧”，因为“在自由的路线上再前进一步，就会是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路线上再迈出一步，就会是财产的毁灭”^② 时，我们还能够继续天真地信仰着这批既得利益者们会有什么非“经济人”理性的人道主义行为吗？

此时我已经深深地体会到，在那个历史转型时期，什么样的革命口号，都能被他们变成反革命的宣言，任何民主性措施，都可以演绎成专政性内容。而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他们有智慧，而是因为他们有权力。而这权力的获得也并不是人民的授予，也不是他们真的有什么水平，而是脆弱的民主进程还不足以抵挡住顽固的专政的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正好体现着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与欲望。罗素在《论历史》中深刻地分析道：“在任何专制政权之下，随着权力所能提供的快乐的经验，掌权人就变得愈发专横暴戾。既然对人的控制权体现为要他们去做他们所不情愿去做的事情，所以，受权力欲所驱使的人就更倾向于对人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

这就明显地启示我们：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变动都可以叫“改革”与“革命”。显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命运也决不应该是将国家资源，将人民财产演化为官僚资本与封建领地。

① 参见（法）司汤达：《红与白》第335页。

② 引自《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第215页，人民出版社。

那么，欧洲大革命时代的群众为什么能够容忍有时甚至支持着这些荒唐的反复呢？说到底，还是来源于封建制度所形成的传统与观念。曾在 1762 年至 1796 年间在位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就公然声称过：“庶民无需受教育，否则他们就不会顺从。”可见，愚昧是专制的基础，用现代语汇来表达，信息的封闭使民主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其实，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沙皇尼古拉二世仍向人民宣称着他那特殊的国情论，他明确告示：“适合俄罗斯人的政权形式，只有罗曼诺夫王朝”，认为建立民主政府是“愚蠢的白日梦”！于是“国情论”带来了贫困，“主权论”赢得了屠杀……

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如果我们在历史的深幽处沉思，就能够发现，今天不仅存在着人类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也同样堆积着用自己的智慧所制造的足以摧毁全部人类文明的核武器！可见，和平与发展的大主题又总是交织着战争与毁灭的插曲，人类还远远不能那么轻松与潇洒。

当年毛泽东在研究美国经济发展史时，曾多次提醒人们要关注美国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吃惊地发现那部象征着美国政治制度的美国宪法在长达两百年里，从总体上看，有那么巨大的应变魔力。它所表现的常态还真的不是什么大破大立，相反却是某种平衡与中庸。显然，毛泽东是想吸收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切带有精华性的东西，这反映着他的胸怀和智慧。这就足以说明，在“经济”的背后是人，而在“人”的背后却是制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则又提醒人们淡化臻于至善，警惕完善主义。这就不由得叫人更容易记起那位大政治家丘吉尔当年一句著名的语录：“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而只是所有制度中缺点较少的一种。”这样看来，当年俄国沙皇的立场——民主将使俄罗斯天下大乱——的观点就纯粹是一个伪问题了。我一直认为，因为民主制度所发生的缺陷和没有民主的必然灾难在性

质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列宁才能够判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不可能取得的胜利”^①。而邓小平则不仅重复了列宁的“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句经典的话，而且更进一步明确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②。

作为制度的民主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马克思曾在他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深刻地揭示它的必要性。他说：“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曾是英雄的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居然后来发展到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来枪决人，说明了正是这种恐怖政策使其走向了反面，这就难怪当 he 也被推上断头台时，巴黎群众居然会袖手旁观。至此，马克思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两条基本措施：其一是普选与罢免制；其二是低薪制。面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禁叫人想起毛泽东1945年的话语，他针对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王朝屡屡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①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这番议论，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特殊的国情也只能显示出“特”在发展道路上，而决不是“特”在发展目标上。

一些人之所以认为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就是因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不必进行对作为国体的民主和作为政体的民主的区别。其实，从特定的意义上讲，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目的，是国体性质所在，而普选制、民主集中制等则是实现民主国家所具体制定的各项民主性制度。作为国体的民主，是目的，是唯一的，而作为政体的民主则是多样的，是手段，而且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如果我们把目的也视为过程，那就等于宣布民主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空想，或者说，根本就不准备实现的愿望，甚至还可以说是拒绝民主的托词。事实做了充分的验证，正是计划经济的历程，“把苏联人民放逐到：世界文明的边缘”。

在司汤达笔下，于连为了“报复”上流社会对他的鄙视，采取了“反叛”的行为：明明是个无神论者，却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虔诚、最忠实的教士；明明是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然而在公开场合却大骂拿破仑；甚至还能够把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弗奉为自己的导师。即使这样，他还是终于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可见，在王政复辟时期，法国贵族勾结资产阶级所树立的壁垒是何等的森严！

如果说于连的命运还有些“悲壮的英雄行为”的话，那么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笔下则猛烈地抨击着一种“媚俗”。在他的作品中所反复表现的主题就是人性在专制高压下那种无法抵御地分裂与自戕。当一个人的灵魂丧失，人格不再存在，肉体最轻松之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6～157页。

际，其实也是灵魂最痛苦、最沉重之时，这种灵与肉的互相残杀与搏斗，必然使人陷于绝境。所以昆德拉才得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浪漫而充满了哲理的结论。他把哲理小说提高到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状态中，就认真地告诉我们，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我价值的认定，决不当走双重轨道。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人布洛克写下了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抗争，最终被淹没了。”昆德拉所要反对的也正是这个现实。

历史的资源，现实的感受，心灵的沉思都体现了“人是追求自由的，然而又处处不在枷锁之中”这一人的社会性、具体性的哲学判断。

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奔腾着两大潮流：一是经济的市场化，它使计划经济体制几乎绝迹；二是政治民主化，它使威权政体、专制政体迅速瓦解。这就是人的社会环境、生存条件、外界制约。

这说明，人类还是从总体上告别了几乎没有沉默权的年代，终于走向了现代文明。因为毕竟“自由并不是一些幸运者专有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类不可剥夺的普世性的权利。”

总之，一方面，人的经济路径同样存在着依赖与锁定，它的基本环境条件仍然是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又在本性加激励的作用下生长着。卡夫卡在《城堡》中借用贺拉斯的话说：“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将以主人的身份上岸。”我认为，这就是历史中人的主动性。

这也就是当我们轻轻地擦拭着历史的时候，也同时映照出自己的心灵。而这种心灵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全人类，谁也禁不住历史的诱惑。

昆德拉相当深刻地讲：“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为本国人了解，那么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我读司汤达时的体会就是这样，我在写这些小东西时所向往的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作用于“小说的智慧”，因为小说所能回答的问题始终是“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在那里，无论人在追求之中所散发出来的灿烂绮丽，还是在归宿之处所体验进去的宁静致远，都是如此。

苏东斌

2000年3月10日

走向现代文明

千年以前，尽管斯巴达克的奴隶大起义已经使那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历了整整上一个千年的强烈震撼，但是，在中国，君权神授，还是那么天经地义，坦坦然然；千年以前，尽管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改制已经在上一个千年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早试验，但是，在西方，象征着科学技术的羊皮纸张仍然显示着教士和贵族们的奢侈与傲慢。

百年以前，尽管世界上已经有了第一台自动洗衣机和保险剃须刀，但是，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仍然未能使中国的四亿同胞摆脱煎熬；百年以前，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甚至提出过消灭家庭，进而才能消灭私有财产根源的激进主张，但是，海洋帝国们的旗帜还是在原始的列强瓜分与殖民奴役中高高飘扬。

时光走进了 2000 年，尽管人类已经扫荡了封建王朝，已经崩溃了殖民帝国，但是，当我们听说，地球上每天挣扎在贫困线的还有 12 亿人之时；当我们得知世界上最富有的比尔·盖茨、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王子和菲利普·安许三个人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最穷的 26 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之时；当我们了解到全世界每年因空气污染就有 300 万人死亡之时；当我们掌握了地球上每年要消失 3.8 万平方英里的森林之时；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在热恋战争，在拥抱灾难，在崇拜愚昧时，我断言，人类还远远没有走向现代的文明。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侧面。牵手新世纪，当我们能够听到人类已经在寻找新大陆，已经筹划太空旅行和移民计划之时；当我们得知生物学家甚至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人类平均寿命可能增长到150岁之时；当我们已经了解在科学家的头脑中人体备件工厂已经孕育诞生之时；当我们已经掌握人类完全可能从海水里获取聚变燃料的新能源之时；尤其是当我们已经看到全球上的互联网已经把信息传播速度降低到为零时，我们还有理由不扫荡悲观的态度，还有理由不崩溃失望的情绪吗？！

所以，在21世纪我们必将坚信：当语言的个性化作为神圣的伙伴逐渐消失之后，一定会动摇那并不是与生俱来，而仅仅是一种文化发明的民族主义的社区基础。因为，人类本身越是走向开放，人类权利就越能超越环境；同样，我们必将坚信：当人类经历过凶猛洪水的肆虐，当人类饱尝过绿洲沙化的辛酸，还能不重新检讨那种不把自然界当作人类的有生命的伙伴，而仅仅对其进行掠夺的人类沙文主义、人类霸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吗？！因为，一旦弱化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仅仅追求自身的解放，也就像当初迷恋计划经济体制一样，是人类“致命的自负”！

曾记得，1992年初，邓小平讲，改革开放就要“敢冒”、“敢闯”。其实，“敢冒”就是勇于承担风险，“敢闯”就是能够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关键又是观念创新。只有当观念转化为政策，政策又转化为法律，只有当程序更具有权威性时，法治才能取代人治，社会才能塑造出既接受有规则的训练，又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现代化的人来。因为有了自由，才能有敢冒敢闯，才能有制度创新。

明代诗人王世贞写道：“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愿人类：远离战争，远离饥荒，远离愚昧，远离封闭，远离乌托邦；祝大家：走向和谐，走向解放，走向知识，走向全球，走向民主、自由、现代化的大剧场。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0年1月1日）

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 市场经济思想

内 容 提 要

1. 摘要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建立在社会主义概念的三层涵义基础之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是包括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确定竞争性价格机制和创造公开公正竞争环境的完整体系；邓小平独特的思维方式表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目的论”）和检验实践的“价值标准”（“是非论”）在逻辑上是完全统一的。

2. 关键词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生前从未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被官方正式提出是1992年夏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但是这个概念却是符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基本思路的，于是也就有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这个命题。这个命题的直接涵义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只是说明，中国要发展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所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另一种表述。围绕着他的经济思想，必然形成三个相关联的主要问题：第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邓小平是怎么想的？第二，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邓小平又是怎样想的？第三，在提出并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时，邓小平有什么特殊的思想方式？

—

邓小平从第一次被打倒的1966年到发表“南方谈话”的1992年，不断提出并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便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曾多次提出疑问

邓小平认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①据说，在80年代中期，他曾问香港作家金庸：世界有多少社会主义？金庸当时十分尴尬地说：“我说不准。”邓小平听后哈哈大笑说，他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可能不下100多种吧。

当代社会，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有朝鲜式、古巴式、越南式的社会主义，更早还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二）直接从反面证伪许多重要观点

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捷克外宾时所作的历史性判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